

·文献学苑·

# 中国古代致仕制度散论

张全晓 (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 致仕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也留下了很大遗憾。文章回顾了致仕制度的沿革历史, 总结了它的主要内容, 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它的利弊得失。

关键词: 致仕制度 历史演变 利弊得失

中图分类号: G2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2-0116-04

## A View of the System of Retirement in Ancient China

Zhang Quanxiao (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Document,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The system of retire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ystem of ancient government official in China. It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ancient China's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nd left deep regret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system of retirement, summarizes its main contents, and apprais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the system of retirem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LC number: G255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2-0116-04

致仕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分析研究历代致仕制度的沿革变迁和利弊得失, 对于改革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退休制度当是有益的。

### 一 致仕制度的沿革

中国古代致仕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商周春秋时期。《尚书》卷八记载:“伊尹既复政厥辟, 将告归”, 可谓官吏致仕的最初形态。<sup>[1]</sup>西周时, 官吏致仕已有了一定的年龄标准。《礼记·曲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 郑玄注释“致事”二字乃“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之意。但尚未形成固定的制度, 而是“君非使之也, 臣自行之也”。<sup>[2]</sup>春秋战国, 群雄蜂起, 为谋取霸业, 各诸侯国对告老致仕较为重视, 《左传》、《国语》中有关诸侯国官员致仕的记载增多。先秦典籍虽有官员致仕的种种记载, 但该时期仍未形成完备的致仕制度。它的正式确立应在西汉末期。这一时期封建制度日见巩固, 官僚机构日见庞大, 官员的新老交替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

题。汉平帝元年下诏:“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 三分故禄, 所一与之, 终其身。”标志着古代致仕制度的正式确立。<sup>[3]</sup>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出于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需要,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由三公九卿向三省六部过渡, 致仕制度无定制。隋唐以后, 三省六部确立, 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致仕制度也相应完善。此时大多沿袭前制, 七十致仕。明清时期, 中央集权高度发展, 官僚政治已相当成熟, 致仕制度也日臻完备。不仅致仕范围扩大, 而且待遇相对提高, 年龄也有所下调。进入近代, 随着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 中国古代官吏致仕制度也走完了它的历程。

### 二 致仕的标准

#### (一) 以年龄为标准

有关官吏致仕条件的规定不一而足, 其中年龄限制最重要, 各朝一般规定为七十致仕。《礼记·曲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 又说:“五十而爵, 六十不亲学, 七十致政。”<sup>[4]</sup>为何定做七十, 《白虎通·致仕》释为:“臣年七十悬车致仕者,

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跼蹐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者路,所以长廉远耻,悬车示不用也。<sup>[6]</sup>正如清梁章钜所言:“古人四十强仕,七十致仕,统计人生居官之日,前后不过三十年。盖一人之聪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无不竭之势。”<sup>[6]</sup>官吏是国家的管理者,人生七十古来稀,体力、精力、智力都难以胜任治国安邦的重任,此时告退以安享晚年,理所应当。虽然历代王朝致仕年龄多以七十为准,但也有提前或推迟的例外。在以年龄为首要条件的前提下,酌情变通也属自然。需提及的是,官吏六十致仕最早始于金朝。金世宗时,六十致仕已成定制。他说:“用人之道,当自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sup>[7]</sup>并诏令“许六十致仕”。<sup>[8]</sup>他自己五十五岁时也曾主动表示:“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过六十,必倦于政事。”<sup>[9]</sup>大定二十七年,宰相宗尹自觉年纪已大,请求退休。有的大臣站出来:“宗尹熟悉朝政,还是再留任几年吧!金世宗当即阻止道:“宰相总天下事,非养老之地。若不堪其职,朕亦自愧焉。”<sup>[10]</sup>

#### (二) 以身体状况为标准

除年龄标准外,官吏退休也考虑身体状况,开此先例的是唐朝。唐时,我国官制已较为完备,在制定有关退休政策时,已充分注意到年龄并不是决定是否退休的唯一标准,而规定为:“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sup>[11]</sup>同时对年未古稀但健康欠佳的官吏又做出:“籍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的规定。<sup>[12]</sup>自此,官吏的健康状况就成为退休的标准之一,为以后各代所继承。这种将年龄限制与身体状况综合考查的致仕标准是比较科学的,既可避免一刀切,又能使具体问题得以灵活处理。

#### (三) 以品职为标准

古代官员致仕的品级和职务历朝历代不尽相同,先秦致仕制度只具雏形,致仕人数甚少,亦无明确的品职规定。汉平帝的诏令中,致仕只限“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亦即品职相当于中央的光禄大夫和地方郡守或封国的相以上的高级官员。中下级官吏无权致仕,也就无权享受致仕后的待遇。唐初尚无品职限制,唐文宗太和元年才下诏规定:“自今以后,常参官五品、外官四品者,然后许致仕,余停。”<sup>[13]</sup>只有京官五品、地方官四品以上才有资格致仕。唐以后,世家大姓的势力土崩瓦解,名门望族垄断高官的现象不复存在,等级制度在退休规定上的反映才不再明显,以后各朝也不再用品职限制致仕与否,只视为确定致仕后待遇厚薄的依据。

#### (四) 以个人才能为标准

除上述情况外,统治者出于政治或其它需要,对元老重臣和专职官员的致仕常做特殊对待。一方面以种种理由拒绝、延缓其致仕,甚至明文予以禁止。如元成宗大德七年诏:

“凡翰林、太史官不许致仕,著为令”。<sup>[14]</sup>明代也规定:钦天监、太医院等机构的官员不参与例行考核,一般也不许致仕,甚至还要求其子孙后代世袭旧业,以资国用。<sup>[15]</sup>裴度为中唐名相,六朝元老,多次告退均不许,七十五岁高龄死于任上;郭守敬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和数学家,也因“以旧臣,且熟朝廷所施为,独不许其请”<sup>[16]</sup>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任职终身的典型。另一方面,统治者又重新召用已老病致仕的官员。如西汉名臣汲黯,虽已致仕返乡,但因治理淮阳的特殊需要,又被武帝重新起用;再如唐初大将李靖致仕后,西部边防有急,唐太宗又任命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安边。与此相反,碌碌无为者则随时可能致仕。据《明会典·致仕》记载:老疾不堪任事者、德不称职者、才力不及者以及浮躁浅陋者往往被勒令致仕。<sup>[17]</sup>可见个人才能也是致仕的重要条件。

### 三 致仕的方式

中国古代致仕的方式主要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先秦及西汉初、中期,致仕官员品级高,人数少,多由致仕者主动提出,皇帝批准办理。如汉宣帝时疏广、疏受父子并为太子师傅,朝廷以为荣。宦成名立之时,他们能够功遂身退,主动致仕,父子相随出关,同归故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疏广致仕既归,每天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从不求田问舍。亲朋好友劝其多置产业,为子孙造福,疏广却说:“我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盈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增其过!”<sup>[18]</sup>被传为千古佳话。汉以后,也有少数官员主动致仕,高风亮节,彪炳史册。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仁宗时尚书左丞韩亿,不仅自己按期退休,而且告诫正在为官的儿子韩绛道:“进取在于知止,宠禄不可过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谢事,归守父母坟墓,则是忠孝两全矣。”韩亿死后,韩绛自誓于墓前:“仕宦至六十,决当乞归田里,洒扫坟垅,期于不坠先训。”<sup>[19]</sup>所以,从五十九岁开始韩绛便申请退休,只因工作需要,直到七十五岁才得获准。尽管如此,韩氏父子“宠禄不可过溢”的知止精神,仍为后世美谈。<sup>[19]</sup>按规定主动致仕,本来完全是情理中事。却被大书特书,反复渲染,正说明了贪禄不止、久仕不退者,大有人在。甚至耄耋之年仍服朱持笏,必须靠强制性手段才能促其致仕。由此可见,大部分致仕行为均为被动,尽管形式上往往是致仕者主动提出,但未尝不是在执行“七十致仕”的政策。此外还有并未到致仕年龄,但因政务有失,惧祸免灾,故引咎自退,乞命归里;或厌倦宦海浮沉,为保衰病之身,以免九族灭顶之灾而要求致仕。这些虽亦系主动提出,但从动因看,实质上还是被动致仕。

#### 四 致仕后的待遇

为酬谢致仕老臣任职期间的贡献,同时也为安抚人心,各朝都从制度上保障官吏退休后的待遇有章可循,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安。

政治待遇:

(一) 升官晋阶。魏晋时,开始加拜散官。诸公致仕拜“光禄大夫”,其它则拜“谏议大夫”。唐宋元明时期,升职加衔多有明文规定。《宋会要辑稿》载“国朝,凡文武官致仕者,皆转一官。”<sup>[20]</sup>《元史·选举志》则言“内外官员,年至七十者,三品以下,于应授品级,加散官一等,令致仕。”<sup>[21]</sup>《明会要》卷四十四记:“秩三品以上,仍旧,四品以下各加一等。”<sup>[22]</sup>这无疑促进了致仕制度的顺利实施。

(二) 参听朝政。对一些致仕的高官,朝廷仍允其参与军国大事,充任顾问。《晋书·王祥传》云:王祥虽以年老致仕,皇帝诏其“不朝,大事皆谘访之。”<sup>[23]</sup>唐玄宗开元五年规定“三品以上,并听朝朔望”,在制度上保证老臣参政。<sup>[24]</sup>这种殊遇对于官吏是一种莫大荣耀,他们自然感恩戴德,竭诚相报。

(三) 恩荫子孙。为保证致仕制度的顺利实施,封建王朝允许致仕官按规定恩荫子孙为官。唐以前,尚无定制。自唐始,对功臣子弟实行恩荫。唐高宗总章元年规定:一人有功可恩及三代,子孙无官者授官,为官者加阶晋爵。<sup>[25]</sup>宋代尤为慷慨,开国即规定“凡文武官致仕者……加恩其子孙。”<sup>[26]</sup>这既激励了在职者发奋,以期致仕时恩及后代,又能使老臣们安心致仕。

经济待遇:

(一) 给俸禄。官吏致仕后,俸禄成为主要经济来源。自汉至清,封建王朝对退休官员一般都给予终身俸禄,以养余年。俸禄多寡,历朝不同,也因退休官员品职高低和功业大小而有区别:如全俸、半俸、三分之一俸、半俸之半等。汉初,无定制,致仕官员俸禄均受上恩。《汉书·石奋传》:“孝景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万石君即石奋,石奋退休前为诸侯相,秩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上大夫禄是比二千石,俸月百斛。石奋退休后享受的待遇是原俸的六分之五。《汉书·周仁传》记周仁退休后享受原俸的三分之二。《汉书·张欧传》载张欧退休后享受原俸的一半稍多。<sup>[27]</sup>武帝后期穷兵黩武,财政捉襟见肘,至平帝元始元年,只好“三分故禄,以一与之”。进入唐代,经济较发达,致仕官吏食禄上升为半俸。《唐会要》卷六十七载:“致仕官给半禄……自今以后宜准此。”<sup>[28]</sup>宋大体承袭唐半禄制,元明基本不变。清入关后,为笼络人心,俸禄较高。《清朝通志》卷七十一记:“恩谕满汉大学士及曾为部院尚书,予告在家,俱按品给予全俸。”<sup>[29]</sup>退休官员的俸禄,一般在归养地政府领取。居京师者,由京师有关机关支給;居地方者,由所在州县支

给。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是这样。

(二) 给赐物。致仕后另一重要经济来源则是君主的赏赐,这既可为俸禄的补充,又是皇恩浩荡的体现。当然,这种待遇非常人可得。君主赏赐的种类颇多,有土地、耕牛、佃户、黄金、钱钞、谷类以及宅第、守家户等。西汉平帝以前,致仕无俸禄,有些官员得到皇帝一次性的赏赐。如宣帝时丞相韦贤的赏赐是“黄金百斤,赐第一区”。御史大夫杜延年的恩赐是“黄金百斤,牛酒,加致医药,赐安车、驷马”。<sup>[30]</sup>唐宋时期,退休官员有了明确规定的半俸,官吏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因此退休时皇帝于半禄之外再特恩赏赐之事大为减少。《旧唐书》、《新唐书》传记部分所载众官,退休后得特赐者寥寥无几。元代前期,对于征服战争中立功的武将和建立政权中立功的能臣,退休时特恩赏赐的,为数不少。明代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进一步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不少大臣未及退休,便被免官削籍,或戴罪归田,退休得到特赐的,为数不多。清代退休官员能特恩赏赐的,为数更少,但毕竟还有,如乾隆时太子太保兼管户部尚书徐本,退休后除享受全俸外,还得到“赐御用衣冠、内府文绮貂皮”的恩赏。<sup>[31]</sup>

(三) 免赋役。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八月,“诏凡致仕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sup>[32]</sup>诏令说今后不论近侍臣僚还是地方官员,凡退休回乡的,免除其全家的赋役和兵役,直到退休官员本人死亡为止。明成祖时的国子祭酒胡俨,于仁宗时退休。仁宗赐敕褒奖他的功绩,进太子宾客,“复其子孙”。即免除他子孙的赋税、劳役和兵役,恩赐范围比以前又扩大了。<sup>[33]</sup>

以上是关于致仕待遇方面的政策规定,在具体操作中还有若干特殊礼遇。如为表彰老臣在职时的贡献并表示敬重长者,高官致仕时皇帝常亲自为其举行欢送仪式。天宝三年,太子宾客贺知章致仕还乡,唐玄宗设帷帐于长安青门,命百官为其饯行,并赋诗惜别。唐时为体恤老臣,还许致仕官以公乘还乡。明清时期,致仕亦多赐驰驿还乡。此外,朝廷还常遣地方官吏“存问”致仕官员。《后汉书》记郑均致仕后,朝廷“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甚至章帝东巡,还亲幸均舍,又敕赐尚书禄终身,郑均因此被时人号为“白衣尚书”。<sup>[34]</sup>宋代也规定,官吏致仕后“仍岁时赐羊酒米面,令所在长吏常加存问。”<sup>[35]</sup>也有将退休官吏安置在学校中,让其教授后人,发挥自己的专长,这既是安置老臣的措施,也是国家重视知识的一种体现。

#### 五 对违反致仕规定的强制措施

尽管历朝历代皆对致仕官优礼相加,但致仕前后在待遇、权限及其他超经济所得方面仍有着很大差别。因此,政府虽屡申退休制度,官吏仍是贪利者多,知退者少。有些官

员甚至衰老到难以行走,也不愿主动退休。如北魏大臣罗结,直到一百一十岁才歪歪倒倒地退下来。<sup>[36]</sup>又如《旧唐书》记驸马窦诞精神衰耗,殊异常时,与太宗说话已“昏忘不能对”,仍尸禄而不退。<sup>[37]</sup>武则天时宰相苏良嗣,谢恩拜伏时竟“不能复起”,被“舆归其家”,当日即死,年已八十有五。<sup>[38]</sup>宰相许敬宗因年老体弱,不能步行,每朝日只能“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理事,直到临终前方“抗表乞骸骨”,时年已届八十。<sup>[39]</sup>白居易《秦中吟·不致仕》诗有言:“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缕,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佝偻入君门。”正是这种贪荣恋栈者的生动写照。<sup>[40]</sup>只进不出,人事更替不能正常进行,必致官员膨胀、机构臃肿、官制混乱、财政枯竭,甚至可能造成统治危机。这种情况宋代尤显突出,如老官僚吴虔裕见王彦超七十致仕后,经济收入减少,当即说:“我纵僵仆殿阶下,断不学王彦超七十致仕。”<sup>[41]</sup>因此仁宗皇祐三年:“诏文武官七十以上未致仕者,更不考课迁官”。<sup>[42]</sup>后来又采取“特与致仕”、“直除致仕”等强制手段,以推动致仕制度的实施。明清以后,士风日下,官吏们不惜隐瞒年龄来延迟退休,有的多至十几岁,甚至还有八十高龄再度升迁的咄咄怪事。为此,清代规定:“年老有疾,恋职不去而被议者,则勒令休致。”<sup>[43]</sup>象这种停止考核、不予转官、勒令退休,还有不准荫补子孙、降级致仕等强制性措施,它与退休的标准,退休后的待遇等共同构成了古代官吏致仕制度的完整内容。

## 六 致仕制度评价

综上所述,致仕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的建立和推行,改变了“躁竞求进者多,知止求退者少”的局面,<sup>[44]</sup>促进了官员队伍的新陈代谢,提高了行政效率。既有利于开放政权,延揽人才,缓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形成良好政风。又可使官民比例趋于合理,减少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保持长治久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根据身体健康状况,对身患疾病无法进行正常政务活动的官员提前致仕,对文化科学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推迟致仕,延长任职年限。这些灵活务实的特殊措施,也值得称道。因此,我们对古代官吏致仕制度应基本予以肯定。

受阶级和时代局限,古代致仕制度仍多有弊端。如致仕官员的子弟不论德才,一律恩荫,这种变相的官位世袭,造成大批冗官,助长不正之风。又如致仕制度主要施用于高级官吏,中下级官吏致仕无门,他们为日后打算,自然难免巧取豪夺,

从而加剧吏治败坏。尤其是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常因一己之好恶,随意“特恩”,破坏了制度的严肃性,使致仕制度常常近于废止,消极影响显而易见。

参考文献:

- [1] 尚书正义 M.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65.
- [2] [4] 礼记正义 M.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231, 1467.
- [3] [30] 徐天麟. 西汉会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434.
- [5] 陈立. 白虎通疏证 A. 诸子集成补编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2-324.
- [6] 梁章钜. 归田琐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
- [7] [8] [9] [10] 脱脱等. 金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01, 1870, 1965, 1676.
- [11] [37] [38] [39] 刘 等.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820, 2370, 2630, 2763.
- [12] 杜佑. 通典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192.
- [13] [24] [25] [28] 王溥. 唐会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175, 1173, 802, 1174.
- [14] 毕沅. 续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5299.
- [15] [17] 李东阳等. 明会典 M.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9: 2955, 235.
- [16]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8.
- [18] [27]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040, 2193.
- [19] [20] [26] 徐松. 宋会要辑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4160, 4146.
- [21] 宋濂等. 元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114.
- [22] 龙文彬. 明会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819.
- [23] 房玄龄等.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989.
- [29] 清朝通志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7171.
- [31] 赵尔巽等. 清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0456.
- [32] [33] 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4, 4128.
- [34] 范曄. 后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946.
- [35] [41] [42] 脱脱等.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4089, 9287, 232.
- [36] 魏收. 魏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987.
- [40] 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4675.
- [43] 昆冈等. 清会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92.
- [44]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908.

作者简介: 张全曦 (1975-), 男,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研究生, 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化的整理与研究。